

学校类型对农民工子女价值观 与行为模式的影响

——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①

熊易寒 杨肖光

摘要: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两种主要渠道。本文在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框架下,讨论学校类型对于农民工子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接近主流价值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一定的疏离;(2)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3)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于个人前景的预期低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具有更强的挫败感。可见,单纯的教育吸纳对于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作用极其有限。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 价值观 行为模式 教育吸纳 社会融合

一、问题与假设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居住和学习。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总人数379980人,在全日制公办和民办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大概占到57.2%,其余的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②对于政府而言,所谓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由流出地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在流入地(上海)教育部门备案并接受其“指导”;后者则是由当地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并直接“领导”的。对于学生而言,二者最大的差别则在于,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大多很差,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与上海本地青少年相对隔绝,后者则或多或少同在一个屋檐下。

社会各界对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公民权利、特别是受教育权利的角度,对现行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进行批判,要求城市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Kipnis, 2011)。本文的立场有所不同:首先,在我们看来,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政治、学习政治的过程。其次,我们并不预设公办学校对于农民工子女是一个更优的选择,而是通过对两类学校的实证研究,探讨两种学校类型对于农民工子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

简言之,我们是在“政治社会化”的理论视野下探讨农民工子女学校生活的政治后果。所谓“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就是人们形成政治倾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和行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的过程(Easton & Dennis, 1980: 7; Jennings, 2007:29-44)。家庭、学校、同侪群体、工作场所和大众传媒构成了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也就是说,个人政治态度、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养成,深受上述组织或群体的影响(熊易寒, 2011)。这是本文写作的理论出发点。

在现代社会中,学校作为政治社会化媒介,其作用尤其突出。对于学校如何影响学生的政治

^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CZZ005)、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09YJC810006)、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10CG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蒋佳佳, 2008,《沪加大投入引导农民工子女学校向民办学校发展》(<http://sh.eastday.com/eastday/shnews/qtmt/20080407/u1a418449.html>)。

态度与行为模式,学界已有充分的研究,其微观机制包括课程设置、教科书、师生互动、课外活动、学生社团、校园氛围等等(阿尔蒙德、鲍威尔,1987:108-109;陈陆辉,2006:3-33;威特,2008:200;Martin,1975;Niemi and Jane,1996)。然而,学校本身的差异并没有受到政治社会化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实际上,名牌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分化不仅具有深刻的“阶级”内涵(布尔迪厄,2004;易林,2007),也会影响到政治社会化的效果。

有学者指出,如果学校的人口构成与社会的微观缩影尽可能接近,那么,学生就能够有效地理解和熟悉自己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多样性。公立学校和综合学校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私人学校、选择性学校或者特殊学校则不属于这种类型(希特,2007:179)。不同的学校类型、不同的学校管理模式也会对学生的政治社会化产生影响(刘伟,2011)。美国学者海沃德(Hayward,2000)的研究显示,精英子弟与工人阶级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更强调自主、参与和独立思考,后者更强调权威与顺从。还有研究发现,由于遵循集中化的官僚管理模式,公立学校在培养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方面,反而不如具有宽松氛围的私立学校(Kapferer,1981)。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构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环境。在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与上海本地人有更多的社会接触(social contact)(Allport,1954;Xiong,2011);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则更多地处于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威尔逊,2007:29-87)。通过对学校环境的比较,我们将重点探讨社会孤立与社会接触对于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如前所述,政治社会化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政治倾向或者说价值观;二是行为模式。本文所考察的价值观主要包括金钱观、平等观、公平观、集体观、知识观和政治观;行为模式则分解为社会互动与自我表现,前者主要指农民工子女与外群体(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受排斥感”的强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后者主要指农民工子女在学校里的表现,是积极上进抑或消极悲观,这与他们对于自身前景的预期高度相关。

依据上述理论前提,本研究力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两类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在价值观方面有何不同?其次,进入公办学校是否有助于促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最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否对个人前景具有更高的预期?围绕这三个研究问题,本文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说及相应的对立假说。

(1)价值趋同抑或价值分化。研究假说1: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学校的符号系统更为发达,价值灌输更为系统,更有可能与城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一致。

对立假说1: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由于更强烈地感受到与城市同龄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距,更有可能对城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产生逆反心理。

(2)社会融合抑或社会排斥。研究假说2: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人的接触更多,交流更多,更有可能消除芥蒂,趋于融合。

对立假说2: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人的接触更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增大,从而强化其“受排斥”的心理。

(3)社会流动抑或阶级再生产。研究假说3: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学校的教学质量更高,对个人前景的预期更高(认同社会流动)。

对立假说3: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升学障碍的存在,对个人前景的预期更低(认同阶级再生产)。

二、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本文的田野调查主要在上海市Y区完成,但是通过文献回顾与比较,笔者发现,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南京等地独立开展的多项调查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赵树凯,2000;韩嘉玲,2001;史柏年等,2005;张蕾、王桂新,2008;史秋霞,2009;王毅杰、

高燕, 2010; 石长慧, 2010; 高明华, 2011), 这表明城市农民工子女是一个同质性程度较高的群体。本质上讲, 本文是将农民工子女这个群体作为一个个案来加以研究, 尽可能收集关于这一群体生活、学习与观念行为方面的信息, 将定量数据与质性材料结合起来分析, 通过两类材料的相互印证、对话, 来保证推论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1) 参与观察。2007年9-10月, 本人经Y区教育局义务教育科介绍, 到该区最大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锦绣学校)短期任教。通过这段时间的支教, 一方面对学生的情况、师生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 另一方面也熟悉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内部管理与运作。此外, 也为日后的访谈与问卷调查铺平了道路。

(2) 深度访谈。本文对农民工子女及其家长、老师, 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公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社工、大学生志愿者、NGO组织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以求全面地揭示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场景。

(3) 问卷调查。2008年4-5月, 笔者对在校农民工子女进行了小规模的问卷调查。考虑到农民工及其子女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相对同质性, 以及其他研究条件上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取以班级为单位有选择的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具体做法是: 在上海市Y区抽取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和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各一所, 分别为锦绣民工子弟学校与沪城中学。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五、六、九年级和公办学校的七、八年级中各随机选取一个班级的全体学生作为纳入样本。共发放问卷252份, 回收251份。受访者当中有农民工子女224人, 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155人, 就读于公办学校的69人。受访者平均年龄为14.1岁, 平均来沪年龄为7.1岁, 平均在沪生活时间为6.9年; 城市儿童27人(六年级, 亦称初中预备班)。针对城市儿童的问卷与农民工子女基本相同, 仅剔除了其中2个与农民工子女相关的问题。^①

表1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学生类型	农民工子女						上海本地儿童			
	性别		班级职务		学校类型		性别		班级职务	
	男	女	学生干部	非学生干部	公办	农民工	男	女	学生干部	非学生干部
人数	102	105	59	163	155	69	18	9	10	17
百分比	45.5	46.9	26.6	73.4	69.2	30.8	66.7	33.3	37	63

数据来源: 本人主持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意识问卷调查》(2008年4-5月)。本文其他统计表格如无特别说明均出于此次问卷调查。

三、学校类型与农民工子女的价值取向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 内容主要涉及金钱观(命题1)、平等观(命题2-4)、公平观(命题5-6)、集体观(命题7-10)、知识观(命题11)、政治观(命题12-14)。我们有针对性地设计了14个命题, 让受访者对这些观点进行判断, 通过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来测量其价值观。问卷要求受访者对这些观点进行判断, 选项1-5分别代表“完全赞同”、“赞同”、“部分赞同”、“不赞同”、“完全不赞同”5个选项供选择。我们将这5个选项依次赋值为1、2、3、4、5, 用平均值来代表受访者对观点的“赞成度”, 数值越小表示赞成度越高, 数值越大表示赞成度越低。同时, 我们还设定了一个参考值, 其代表的是主流价值观, 也就是我们的主流社会就这些观点所公开表达的立场,^②“赞成度”越接近参考值, 就表示同主流价值观越一致, 反

^①由于2007年下半年开始, Y区仅锦绣农民工子弟学校保留一个初中班级(九年级), 而沪城中学以九年级学生面临毕业考试为由拒绝将其列入访问范围, 这就给我们的比较研究带来了困难: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受访者中没有七、八年级, 而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没有九年级。样本代表性受到一定限制。

^②本文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既不是指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持有的价值观, 也不是指上层精英所持有的价值观, 而是指主流社会尤其是官方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

之则越偏离。我们用“近”、“中”、“远”来表示3个群体的立场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调查结果如下：

表2 3个群体对于14个命题的赞同度及其与主流价值观的距离

观点	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N=155)	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N=69)	城市儿童(N=27)	参考值(主流价值观)
1. 金钱是万能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3.67	3.50	3.74	5 (坚决反对)
	中	远	近	
2. 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64	1.46	1.15	1 (坚决赞同)
	远	中	近	
3.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们要努力成为上等人	2.05	2.09	1.67	3 (态度暧昧)
	中	近	远	
4. 从事体力劳动低人一等	3.98	4.08	4.07	5 (坚决反对)
	远	近	中	
5. 人人平均是最公平的, 要穷大家一起穷, 要富大家一起富	2.67	3.33	2.93	5 (坚决反对)
	远	近	中	
6. 贫穷是因为懒惰或无能, 与社会无关	3.43	3.34	3.52	5 (坚决反对)
	中	远	近	
7. 各家自扫门前雪, 哪管他人瓦上霜	3.89	4.03	4.22	5 (坚决反对)
	远	中	近	
8. 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 没有人靠得住	3.52	3.74	4.48	5 (坚决反对)
	远	中	近	
9. 一个人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为此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	2.44	2.94	1.93	1 (坚决赞同)
	中	远	近	
10. 只要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就可以去做, 别人的看法不重要	2.72	2.93	3.15	5 (坚决反对)
	远	中	近	
11.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2.31	2.21	2.19	1 (坚决赞同)
	远	中	近	
12. 政府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没人管得着	4.34	4.21	4.78	5 (坚决反对)
	中	远	近	
13. 政府是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的	4.05	4.13	4.67	5 (坚决反对)
	远	中	近	
14.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都必须服从政府	3.09	3.28	3.33	4 (反对)
	远	中	近	

我们发现：在14个命题中，城市儿童有11项同主流价值观最为接近，仅有一项与主流价值观相距最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为官方本身的态度不明朗）；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有3项同主流价值观最为接近，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非但没有一个观点与主流价值观相近，而且有多达9项与主流价值观差距最远。也就是说，我们的问卷调查更加倾向于支持研究假说1：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价值观的确更加接近于官方所宣传的立场。其原因可能在于：公办学校的符号系统更为发达，价值灌输更为系统。

在沪城中学，墙壁上到处悬挂着各种图案、标语，有的是名人头像和名言，有的则是本校学生的座右铭，还有先进个人的照片与事迹，以及各种竞赛的海报。所有的一切都在昭示见贤思齐、力争上游的主流价值观。而在锦绣农民工子弟学校，粗制滥造的墙报上只有学费、就餐费和车费的公示、教师值勤表，以及各个职能部门就学生安全问题的规定，以学生作文和照片为主要内容的校园集锦早已色泽暗淡。

在锦绣农民工子弟学校，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每天上午9点半的课间操。校长、教导主任和值日老师站在面向操场的阳台上，通过高音喇叭指挥学生入场，在升旗仪式之后，学生开始做广播体操，教师则在队伍的后面监督，当某个班级表现不佳或有学生捣乱时，值日老师使用高

音喇叭喊话,一些顽皮的学生会被要求事后到校长办公室接受训诫。体操完毕,校长或教导主任开始训话,主要内容不外乎几种:一是点名表扬/批评最近表现优异/不佳的班级;二是对好人好事(大多是小额的拾金不昧)进行逐个点名表扬。如果政府职能部门将要前来检查,则会花不少时间告诫学生务必循规蹈矩,把教室和厕所打扫干净,有时候为保持厕所的清洁,甚至会要求学生领导检查的那段时间不要上厕所。

相比之下,公办学校的符号体系和仪式较为强调学生的自主性、自律性,而农民工子弟学校更为强调学生对学校权威的服从,这也间接反映了农民工子弟的桀骜不驯,以至于校方不得不反复地捍卫和强化自身的权威。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或多或少进行了一定的选拔,而成绩较好的学生更有可能认同主流价值观,或“自作聪明”地反馈研究者所“期望”的答案。在2006年之前Y区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整顿力度之前,少数农民工子女是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进入公办学校,此后,由于每年被取缔或拆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较多,在区教育局的统一安排下,部分公办学校承担了“善后”的功能,对生源的要求降低,一般只要“五证”(身份证、临时居住证、计划生育证、社会综合保险办理证明和工作证)齐全。在这种情况下,两类学校的生源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基本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夸大两类学校的差异,如果不考虑3个群体的排序,而从赞成度的数值来看,那么,不论是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他们与城市儿童的分歧很小,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对于主流价值观否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熊易寒,2009/2010a)。

四、同校是否意味着社会融合

美国学者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认为,如果群际无知和漠视导致群体间的冲突,那么,增加群际成员之间的交流与接触,将有助于化解族群间的偏见与歧视。因为族群歧视与冲突往往根源于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不同族群间频密的接触互动,由熟识而逐渐理解,将有助破除双方的“刻板印象”,避免以“类属”、“简化”的方式看待不同族群的成员。这就是著名的“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Allport,1954;耿曙、曾于蓁,2009)。

但奥尔波特同时也指出,接触要达到良好的效果是需要条件的:第一,群体间的接触应当是长时间的而不是暂时的,并且涉及某些合作活动,以建构积极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二,应当有正式的、制度性的框架以支持融合;第三,理想意义上,接触应当涉及同等社会地位的人(方文,2008:85-86)。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接触可能非但不能破除刻板印象,反而会加深偏见与歧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虽然有机会与城市同学长期接触,相对一部分学校对其实行“独立编班”,这大大限制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人的积极互动;加之农民工子女的家庭背景、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同龄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上述条件并不完全具备。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与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研究假说2: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学生,与城市同龄人的接触更多,交流更多,更有可能消除芥蒂,趋于融合。

对立假说2: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学生,与城市同龄人的接触更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增大,从而强化其“受排斥”的心理。

到底哪个假设更加符合实际呢?我们先来看两类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于“独立编班”的态度(见表3)。

表 3 不同类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于独立编班的态度

	公办学校	农民工子弟学校
1.反对, 因为人人平等, 这是对我们的歧视	20(29.0%)	54(34.8%)
2.反对, 因为这样不利于我们的学习	1(1.4%)	6(3.9%)
3.赞成, 因为我更喜欢和外地同学在一起	2(2.9%)	15(9.7%)
4.赞成, 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学习	6(8.7%)	11(7.1%)
5.要看学校是出于什么目的, 然后再做决定	34(49.3%)	56(36.1%)
6.不知道	6(8.7%)	13(8.4%)
合计	69(100%)	155(100%)

透过表 3, 我们看到: 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该校实行独立编班)当中对独立编班持反对意见的比例要比农民工子弟学校低大约 8 个百分点, 选择“视学校目的而定”的比例要高出后者 13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 正处于独立编班状态的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对独立编班的态度反而相对温和。这说明独立编班与混合编班并不是简单地对应着隔离与融合, 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访谈, 我们发现:

一方面, 混合编班的确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尽管学校声称实行分类教学、独立编班是从教育规律出发——把学习能力和出身背景相似的学生编在一个班级进行教学, 教师容易把握班上学生的学习进度, 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但是实际上, 分轨制(tracking)或分类教学导致了永久性将学生分为优生和差生的倾向, 农民工子女感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歧视, 会越发丧失学习的积极性(Oakes,1990; Kozol,1991; 威特, 2008: 201; 斯达纽斯、普拉图, 2011)。

另一方面, 混合编班虽然强化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互动, 但也同时增加了发生摩擦的概率。独立编班状态下, 双方由于隔离而相安无事; 混合编班反而使双方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 更容易发生冲突。儿童之间的人际冲突其实非常普通, 但由于身份因素的介入, 使这种冲突往往被解读为一种歧视, 从而加剧双方的对立。混合编班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成绩, 但不能有效地化解群体隔阂、促进社会融合。

在沪城中学, 农民工子女被独立编班, 从预备班到初三年级, 编号都是(五)班, 所以(五)班就变成了“民工班”的代名词。更有意思的是, 这些(五)班都被安排在教学楼的一楼, 所以(五)班的学生形象地称上海生源的班级为“上面的班级”。杨洋说, 原本学校的一楼是没有班级的, 我们进来就变成(五)班的教室了。这种安排让人不能不联想到空间的隐喻色彩: 一楼即底层, 而班级和阶级在英文中对应的是同一个词汇(class)。于是, 农民工子女的班级构成了这所学校的底层, 正如他们的父辈构成了城市社会的底层。

对此, 学校的老师解释说: 是因为农民工子女人数较多, 该校又实行小班化教学, 每个班的规模不超过 30 人, 没办法让他们插入上海本地学生的班级。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杨洋对独立编班并不介意, 她认为独立编班可以让他们更加自信。

比杨洋低一级的李榴告诉我: “我们班曾经有人跟上海学生玩得很好, 后来又打架闹翻了, 班主任就批评班里的同学, 说以后不准与上海学生交往了。所以我们都不敢去和上海的学生交朋友, 我们觉得上海的同学看不起我们。”存在于校园之内的城乡二元结构, 其边界是如此的敏感, 以至于学生打架之类的人际行为会被有关行动者理解为上海学生与农民工子女的群际行为。为什么农民工子女的一举一动总是被贴上群体的身份标签呢? 为什么他们不能作为“杨洋”、“李榴”这样的个体而存在, 而必须时时刻刻作为“农民工子女”这样一个群体的成员而存在呢? 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仿佛已经“身体化”(embodied)了, 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幽灵”(Woronov, 2004)。

正如我们从杨洋和李榴身上看到的, 进入公办学校并不意味着社会融合, 更无法抹煞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毋宁说, 城乡二元结构被压缩到了一个更小社会空间(校园)当中。在过去孩子们必须借助抽象思维才能感知它的存在, 而现在孩子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了——在沪城中学, 表现为“底层”的教室和统一的班级编号; 而在对面的沪城小学, 不仅空间是分隔的,

时间也是分隔的，农民工子女集中于一幢小教学楼上课，就连上下课的时间也是与其他班级错开的。阶级的区隔就这样被创造性地“物化”了。

反讽的是，这种区隔的模式居然达到了减少冲突的目的：反而是更具“融合”色彩的混合编班模式，让孩子们强烈地感觉到不平等。在由农民工子女组成的“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孩子们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一方认为上海学生老是瞧不起外地学生，而老师也总是偏袒上海学生；另一方则认为老师对上海学生、外地学生一视同仁，甚至偏爱外地学生。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持前一种观点的孩子大多来自混合编班的学校，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孩子主要来自独立编班的学校。同样让人惊讶的是，那些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往往激烈地反对独立编班，认为这是对农民工子女的一种歧视，有悖于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大多数农民工子女，不论所在学校是独立编班还是混合编班，反而更倾向于独立编班，认为混合编班容易产生歧视和自卑；少数反对“独立编班”的受访者也是从学业成绩的角度而不是以平等的价值观为出发点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同校，更有可能强化其“受排斥”的心理，而不是促进社会融合；同样是公办学校，混合编班的模式较之独立编班，虽然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提高，但却使之感受到排斥。当然，较少的“受排斥感”并不意味着融合，毋宁说是由隔绝导致的漠然。

五、自我预期的政治学：社会流动抑或阶级再生产

社会分层研究对于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素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学校教育是个人的实现社会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平等(Lenski, 1966)；但亦有学者指出，“学校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因为教育是社会精英阶级为抢占较好职业位置而排斥其他社会阶级的工具，教育具有维持精英再生产的能力(刘精明，2008；斯达纽斯、普拉图，2011)。

笔者的调查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在毕业后去向向上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卡方检验 p 值大于 0.05），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学校学生希望直接找工作的比例明显高于公立学校，而相应的希望回老家念高中的比例则低于公立学校 10 个百分点(见表 4)，这提示我们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要比公办学校的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纪律性也更差。此外，高年级要比低年级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对前途更加悲观——体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九年级学生选择初中毕业后“回老家念高中”的比例较五、六年级有非常显著的下降，公办学校中八年级对七年级的相应比例也有所降低，同时卡方检验显示各年级间在毕业前途选择上有明显差异。(见表 5)；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孩子们对于升学和成功的预期。高年级比低年级更容易看到升学的制度性瓶颈，一方面在上海无法考高中、考大学；另一方面，由于这边的教材不配套、教学管理不严，回老家考高中也缺乏竞争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杨洋的班级，当他们发现就地升学无望的时候，多数人都放弃了努力。

表4 不同类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的打算

选项	公办学校	农民工子弟学校
1.直接找工作	1(1.4%)	12(7.7%)
2.学一门手艺	16(23.2%)	38(24.5%)
3.在上海念职高或技校	24(34.8%)	55(34.5%)
4.回老家念高中	27(39.1%)	45(29.0%)
5.其他	1(1.4%)	5(3.2%)
合计	69(100%)	155(100%)

卡方值：6.5021，自由度：6，P值：0.3694。

表5 不同年级的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的打算

选项	农民工子弟学校			公办学校	
	五年级	六年级	九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1.直接找工作	2(4.0%)	8(16.0%)	2(3.6%)	1(2.9%)	0(0)
2.学一门手艺	14(28.0%)	7(14.0%)	17(30.9%)	7(20.6%)	9(25.7%)
3.在上海念职高或技校	13(26.0%)	11(22.0%)	31(56.4%)	11(32.4%)	13(37.1%)
4.回老家念高中	19(38.0%)	23(46.0%)	3(5.5%)	14(41.2%)	13(37.1%)
5.其他	2(4.0%)	1(2.0%)	2(3.6%)	1(2.9%)	0(0)
合计	50(100%)	50(100%)	55(100%)	34(100%)	35(100%)

卡方检验结果：卡方值：45.0553，自由度：16，P值：0.0001。

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题目是“如果你们班有个同学，理想是成为上海市长，你会觉得他/她”，三个选项分别代表三种态度：选项1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很大，心态乐观；选项2认为社会流动机会不那么大，但心态积极；选项3认为社会流动机会渺茫，心态悲观。调查结果发现：

(1) 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要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更加悲观，前者选择第一项的比例要低20个百分点，选择第二项的比例高出15个百分点，选择第三项的比例多了一倍，两类学生群体态度统计上也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更加倾向于支持对立假说3：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学生，由于升学障碍的存在，对个人前景的预期更低（认同阶级再生产）。

(2) 在受访的农民工子女当中，年级越高的学生对社会流动机会的看法越倾向于悲观，随着年级/年龄的增长，选择选项1的比例逐渐降低，而选择选项2和3的比例逐渐升高，唯一的例外是八年级和九年级。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学校类型的干扰而造成的假象——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八年级学生全部来自公办学校，九年级的学生全部来自农民工子弟学校。同时，不同年级学生间也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3) 上海本地儿童对社会流动机会的看法要乐观得多，有多达6成以上的学生认为有志者事竟成，剩下的接近4成学生持第二种态度，没有人选择第三个答案；而农民工子女有超过半数的人持第二种态度，认为有志者事竟成的比例比上海本地儿童少了20多个百分点，同时还有6.7%的人对社会流动机会彻底绝望。卡方检验p值为0.067，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差别。

表6

如果你们班有个同学，理想是成为上海市长，你会觉得他/她（不同类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回答）

选项	公办学校	农民工子弟学校
1.有志者事竟成，他/她一定会成功	19(27.5%)	74(47.7%)
2.有理想，即使不能实现，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43(62.3%)	73(47.1%)
3.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注定失败	7(10.1%)	8(5.2%)
合计	69(100%)	155(100%)

卡方检验结果：卡方值：8.6023，自由度：2，P值：0.0136。

表7

如果你们班有个同学，理想是成为上海市长，你会觉得他/她（不同年级的农民工子女的回答）

选项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1.有志者事竟成，他/她一定会成功	32(64.0%)	26(52.0%)	13(38.2%)	6(17.1%)	16(29.1%)
2.有理想，即使不能实现，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18(36.0%)	21(42.0%)	19(55.9%)	24(68.6%)	34(61.8%)
3.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注定失败	0(0)	3(6%)	2(5.9%)	5(14.3%)	5(9.1%)
合计	50(100%)	50(100%)	34(100%)	35(100%)	55(100%)

卡方检验结果：卡方值：27.8664，自由度：8，P值：0.0005。

表8 如果你们班有个同学，理想是成为上海市长，你会觉得他/她

选项	农民工子女	上海本地儿童
1.有志者事竟成，他/她一定会成功	93(41.5%)	17(63.0%)
2.有理想，即使不能实现，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116(51.8%)	10(37.0%)
3.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注定失败	15(6.7%)	0(0)
合计	224(100%)	27(100%)

卡方检验结果：卡方值：5.3807，自由度：2，P值：0.06786。

不难发现，升学的“天花板”对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产生了显著影响，以至于年级越高，越是悲观。这种天花板既表现为现实生活中个人发展的瓶颈，也表现为个人对自身前景的低水平预期。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就是指农民工子女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自身的前景产生了较低水平的预期（仿佛有一块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动的空间），从而主动放弃了学业上的努力，我们不妨称之为“制度性的自我放弃”。

在对沪城中学教师的访谈中，我发现，“聪明”、“活泼”、“机灵”、“贪玩”、“骄傲”这些形容词被慷慨地赋予城市儿童，而“勤奋”、“吃苦耐劳”、“胆怯”、“迟钝”则成为“民工子女”的专利。研究者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默顿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使学生一开始具有相同的学术能力，那些被教师认为聪明的学生，最终在学术上还是会超越那些被认为愚蠢的学生。教师给那些所谓的“笨学生”更少的时间回答问题，更多地批评他们的失败，更少地表扬他们的成功，以及更少地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一旦学生意识到教师对自己的期望很低，他们便倾向于破罐子破摔，从而“证明”教师对他们的低预期是正确的(Rosenthal & Jacobson, 1968; 斯达纽斯、普拉图, 2011; 高明华, 2011)。

如果说农民工子女与上海孩子在学业上存在一定差距的话，这首先是因为天花板效应所导致的自我放弃。社会学家麦克劳德 (MacLeod, 1995)在调查城市贫困白人青年男子对于教育的态度时发现，这些年轻人意识到，即使他们有正确的态度，认同主流价值观，刻苦学习，进入学校并最终毕业，也难以改变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既然付出未必有回报，还不如放弃学业上的努力，投身社会交往和课外兴趣（转引自威特，2008：204）。农民工子女的情况与之相似，他们发现再多的努力也无法克服制度上的限制（如升学障碍），便索性放弃了学业努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欠缺，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的父母都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现代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全方位”和“立体式”，除了学校教育，父母、家庭教师、专业培训机构也参与其中，孩童之间的学业竞争也愈益提前，以至于出现了“幼儿园大战”，这就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时间加长、投入加大，而农民工家庭显然无力负担如此昂贵的教育成本。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则是另外一种机制在发挥作用。与公办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流行保罗·威利斯(Paul E. Willis)所说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Willis, 1981)。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正如威利斯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追求“男子汉气概”(masculinity)一样。进入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室，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前者秩序井然，而后者明显缺乏纪律性。

据笔者调查，几乎每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存在小“帮派”。“帮派”成员经常集体逃学、打架滋事，让学校管理层头疼不已。他们还喜欢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来挑战老师的权威，譬如寻找老师的弱点或特征，背地里给老师起绰号；当老师在讲台上很严肃地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挑其中的语病而制造“笑场”；极个别的学生在受到老师处分之后，甚至还会公开宣称要报复。

初中毕业后，农民工子女面临三个选择：其一，在上海念中专、技校或职高；其二，回老家考高中；其三，打工。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的一项调查显示，初中毕业后，有约一半的来上海农民工子女留沪跟随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成人中专、技校或其他中等学校就读，另有一半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散落在社会之中，处于就学就业两难境地。^①

事实上，只有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男生居多）回老家继续念书。在这批念高中的学生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进入大学（从而改变户籍身份、实现向上流动），毕竟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距高达5.8倍。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最有可能获取的教育资源（中专、职高、技校），都是倾向于阶级再生产而不是社会流动的。初中一毕业，很多孩子就被直接抛入社会，等待他们的，不是锦绣的前程，而是与父辈相近的“3D”职业，即难(difficult)、脏(dirty)、险(dangerous)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反学校文化是由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共同生活机遇(common life chances)促成的，对未来的低预期使孩子们对学校教育失去了兴趣。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公办学校面临升学的压力，教学质量是第一位的，这就要求对学生的身心有更多的控制和规训。而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来说，学生的人身安全是首位的（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也以安全和卫生为主），只要学生在上学时间“不出事”即可，因而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侧重身体的控制，而不是心灵的教化；“师资队伍”的流动性也使得教师相对缺乏责任感，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较少，譬如公办学校常见的家访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几乎不存在。在后一种环境中，农民工子女很容易就发现学校与自身的利益冲突，从而对学校的一切持怀疑的态度。有别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并不认为成绩差或中途辍学是人生的失败，高年级学生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步入社会，享受由工作所带来的成人地位。

威利斯通过对反学校文化的分析，强调工人阶级子弟在文化上的能动性与其创造性，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中包含着对真实状况的模糊认识，“部分地识破”(partial penetration)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不仅仅是“虚假意识”。因此，威利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以区别于强调共谋与一致的“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 (Willis, 1981; 吕鹏, 2006)。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构成对阶级再生产的挑战，毋宁说，反学校文化是农民工子女对阶级再生产的一种反应。一方面，通过反学校文化，孩子们（不自觉地）宣泄了对阶级再生产的不满，这是其反抗和自主的一面；另一方面，反学校文化使得他们进一步丧失了个体流动的机会，更早地步入社会，从而加速和巩固了阶级再生产，这是其讽刺和悖谬的一面（熊易寒，2010b）。

六、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学校类型对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确实是有影响的，但很难用“好坏”来评价这种影响。公办学校较之农民工子弟学校，具有更强的价值灌输能力，这使得就读于此的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更为亲和，他们的学业成绩也要明显优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冯帅章、陈媛媛，2011）；但是，与城市同龄人更多的社会接触并没有使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反而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他们希望向上流动，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注定了他们即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取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成就。这让很多学生对未来产生了低预期，并自动放弃了对学业的追求。这种天花板效应在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更多地受到主流价值观的熏陶，同时却对前途表现出更多的悲观。相比之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更加具有叛逆性，形成了与学校当局对着干的“反学校文化”。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不同，他们并不以成绩差和低收入职业为耻，

^①肖春飞、王蔚、刘丹，2008，《城市高中因户籍难向农民工子女开放》(<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8/102914960897.shtml>)。

而且为自己的反叛行为感到自豪。

需要说明的是,天花板效应与反学校文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绝不是说,前者仅适用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后者仅适用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而是说,由于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好,价值灌输更成功,学生的升学愿望更强烈,当他们遭遇升学障碍时,挫败感也就更为强烈,因此,天花板效应在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相反,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较差,随时面临取缔的风险,校方的精力集中于应付检查、保障安全和实现利润,疏于教学与教化,学生与校方更多地处于对立面,纪律松弛,学业荒废,导致了反学校文化的盛行。对于两类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而言,这两种机制只存在程度的差异,而不存在或“有”或“无”的截然两分。

不得不承认,本文仅仅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一个侧面。影响农民工子女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本人的研究发现,最主要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包括家庭、学校、政府、同侪群体和社会干预(NGO、志愿者),而且,这些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相互强化,有时相互抵消(熊易寒,2010b)。更大的难题在于,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不是封闭的,而是终身开放的,更何况是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因此,要真正把握农民工子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意义,不仅需要全景式的观察,而且需要长时段的纵贯研究。

如果说本研究有什么政策含义的话,那么决不是说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学校毫无意义,而是说仅仅开放公立学校还远远不够,单纯的教育吸纳对于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作用甚微:一方面,现行的教育体制无法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足够的生活机遇和上升空间,因为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排斥是系统的、制度化的,如果就业、社会保障、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歧视仍然存在,那么义务教育阶段的吸纳将难以产生正面效果(熊易寒,2010c);另一方面,学校本身也处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空间之中,与其他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场域相比,教育只是一个居于从属地位的场域(布尔迪厄,2004),它难以逆转由市场和权力共同缔造的阶级不平等。

可喜的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这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政策正在逐渐向“移民”政策转化,以城市为本位的治理逻辑转变为以公民为本位的权利逻辑(熊易寒,2009)。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从制度层面来解决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合问题,以公民权为核心,以城市化、移民化为动力,通过减少制度性歧视、促进社会流动来实现社会融合(唐世平,2006)。

参考文献:

- 阿尔蒙德、鲍威尔,1987,《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布尔迪厄,2004,《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
- 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
- 陈陆辉,2006,《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载冷则刚等主编《政治学》,台北五南图书。
- 方文,2008,《学科制度与社会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冯帅章、陈媛媛,2011,《学校质量与流动儿童教育: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城市的未来:外来儿童教育政策研讨会暨校长论坛”会议论文(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办)。
- 高明华,2011,《教育不平等的微观动力学及干预机制——在农民工小学生中的研究发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
- 耿曙、曾于葵,2009,《交流不只请客吃饭:中共邀请台湾青年政策的政治影响》,《问题与研究》第4期。
- 韩嘉玲,2001,《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第8期。
- 刘精明,2008,《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刘伟,2011,《政治社会化》,载尹继武主编:《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 吕鹏,2006,《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石长慧,2010,《身份认同与社会定位:北京市城中村流动少年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
- 史秋霞,2009,《户籍制度背景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图景》,《青年研究》第6期。

- 史柏年等, 2005, 《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问题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斯达纽斯、普拉图, 2011, 《社会支配论》, 刘爽、罗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唐世平, 2006, 《社会流动、地位市场和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王毅杰、高燕等, 2010,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威尔逊, 2007, 《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成伯清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威特, 2008, 《社会学的邀请》, 林聚任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希特, 2007, 《何谓公民身份》, 郭忠华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熊易寒, 2009, 《城市化的孩子: 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 《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 , 2010a,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开放时代》第1期。
- , 2010b, 《城市化的孩子: 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2010c, 《开放“初中后”教育, 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2日。
- , 2011, 《青少年的政治倾向有多重要: 政治社会化研究50年回顾》, 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9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易林, 2007, 《阶级、名校与不平等》, 《读书》第10期。
- 张蕾、王桂新, 2008, 《第二代外来人口教育及社会融合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西北人口》第5期。
- 赵树凯, 2000, 《边缘化的基础教育: 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 《管理世界》第5期。
- Allport, Gordon 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 Easton, David & Jack Dennis, 1980,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iemi, Richard G., and Jane Junn, 1996, *Civic Educ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yward, Clarissa Rile, 2000, *De-Facing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M. Kent. 200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pferer, Judith L. 1981, "Socialization and the Symbolic Order of the School",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12, No. 4.
- Kipnis, Andrew, 2011, "How best to educate a mobile population", *China Daily*, March 30.
- Kozol, Jonathan, 1991, *Savage Inequalities: Children in America's School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 Lenski, G.,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Martin, Roberta. 1975, "Th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China and on Taiwan: An Analysi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2.
- Oakes, Jeannie. 1990, *Multiplying inequalities: the effects of race, social class, and tracking on opportunities to lear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Rosenthal, R. & Jacobson, L.F. 1968. "Teacher expectations for the disadvantaged", *Scientific American*, Vol.128, No.4.
- Willis, Paul E., 1981,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oronov, T.E. 2004, "In the eye of the chicken: Hierarchy and marginality among Beijing's migrant school children", *Ethnography*, Vol 5(3).
- Xiong, Yihan, 2011. "Underclass, School and Class Reproduction: Why did Education Fail to Provide Upward Mobility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Shangha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1 Annual Meeting, Honolulu, March 31–April 3.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中国医学院信息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 昕